

浙江省革命标语类文物调查及本体保护研究

胡瑜兰 解瑶 王晨娅 毛冉 马儒旭

2021年，国家文物局印发《革命文物保护单位“十四五”专项规划》，强调强化科技支撑，加强红军标语保护等关键技术研究，支持文物博物馆机构与高等院校合作开展革命文物领域相关研究。在规划指导下，浙江大学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联合，对浙江省衢州市、丽水市、宁波市内各处革命文物展开详细调查与记录。

标语是革命文物中的重要类型

革命标语文物是不可移动革命文物中的重要类型，是弘扬革命传统和传承革命精神的重要载体。根据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的统计，浙江省拥有丰富的革命标语类文物资源。但是，由于自然侵蚀以及人为破坏等，许多标语的保存现状并不理想，出现地仗脱落、空鼓、裂隙等损坏现象，甚至面临着消失的风险。而且，目前国内有关革命标语类文物的研究大多是针对其标语内容、历史价值以及宣传方式方面，对革命标语本体保存现状和保护技术的研究较少，且大部分停留在理论阶段，缺乏成熟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手段。因此，革命标语类文物亟需我们的关注以及研究保护。

国内针对革命标语类文物的研究薄弱，以往关于标语类革命文物的保护主要是借鉴国内外有关壁画和建筑的先进保护技术。本次调查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古代壁画病害与图示》（GB/T30237-2013），将红军标语类文物病害分为28小类，将病害程度记为三档，即轻度病害、中度病害和严重病害。其中，轻度病害是指对文物内部结构或者形貌原状影响较小的病害；中度病害是指已对文物内部结构或形貌原状产生较大影响，但危害性和破坏性还不高的病害；严重病害是指已经对文物内部结构或形貌原状产生巨大威胁或破坏的病害。

工作人员深入现场开展标语调查、信息采集、数据上报工作。对调查中发现的红色标语进行归类整理，通过现场辨认、测量、拍摄、记录等手段，对红色标语进行数字化采集。

本研究以浙江省衢州市、丽水市、宁波市内各处的革命标语类文物为主要研究对象，调查工作主要包括以下内容：记录红军标语的地理位置、内容、年代、材质、载体、大小、书写材料、现场环境等基本因素；对红军标语进行影像采集、色彩比对以及比例尺拍照等；对其保存状况进行调查，记录其病害种类以及病害程度，并整理成文，评估整体保存状况；对典型红军标语进行取样，以供后续实验室检测分析。

实验室对样品分析主要包括显微成像、硬度检测、密度检测、热重分析、XRD以及有机成分分析检测工作。进一步以衢州市衢江区里村红军标语为典型案例提出针对性的保护管理建议。希望通过本研究，推动革命标语类文物的保护进程，建立完善的基础数据库与研究体系，为革命标语类文物保护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

此次调查了衢州市红军标语11幅、宁波市革命标语82幅、丽水市革命标语9幅。

革命标语类文物本体现状分析

以衢州市为例，进行本体现状的统计和总结。11幅衢州市红军标语都属于墨书标语。其中有4幅由于各种自然因素及人为因素而消失；现存7幅，其中3幅褪色严重以至于无法辨认标语内容，1幅经过粉刷重绘。标语保存情况极不乐观，消失率达到36%，可辨认原本内容的标语仅占27%。

根据统计结果，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及龙游县现存的7幅红军标语中，总病害面积达997.27平方分米。其中，褪色为第一大病害；地仗脱落为第二大病害；修复不当为第三大病害。严重病害面积占比55%；轻度病害面积占比35%；中度病害

面积占比10%。革命标语文物面临的病害主要有以下几类。

褪色原因推测为风侵雨蚀和光致氧化。红军标语的书写材料往往就地取材，常见的有黄泥浆、土烧红、石灰水、锅底灰等，其稳定性易受光辐射、湿度以及空气中的酸性气体影响。风吹日晒、雨水侵蚀等都会使得暴露在外的标语基体成分扩散稀释，从而逐渐变淡褪色。且衢江与龙游两地皆是多雨地区，3月到6月为多雨期，又逢高温，加之除源头村徐氏民居以及庙下——梧村古道两地的标语外，其余标语都直接裸露在外，标语表面温差大，风化速度加快，字迹模糊。

地仗脱落是极为常见的一类病害，其往往是龟裂、裂隙、起甲等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引起的，此次调查中所有统计对象都存在该病害。地仗脱落不仅会影响地仗层，而且可能导致标语字迹一同脱落，以致字迹消失，影响对标语内容的辨认。

修复不当主要由于在对标语所处房屋修缮时材料使用不当。

泥渍是指泥浆在壁画上留下的痕迹。所幸调查对象中泥渍主要存在于字迹周围，较少污染到字迹本身。

起甲是指壁画的底色层、颜料层或表面涂层发生龟裂，进而呈鳞片状卷翘的现象。起甲主要由于各层之间的受力不平衡，与文物本体材质并无太大关系，温差过大时极易引起起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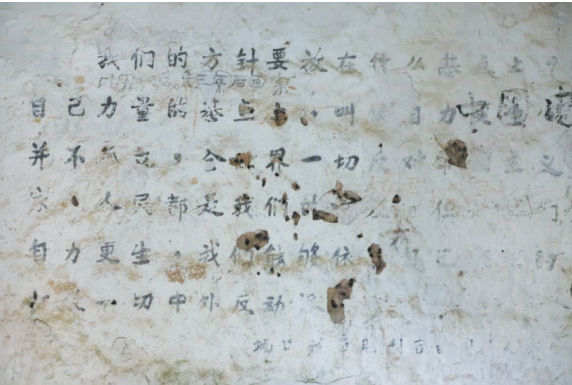
空鼓是指地仗层局部脱离支撑体，但脱离部分的周边仍与支撑体连接的现象。雨水作用导致表面溶蚀，因而水分有条件进入内部，内部遇水后急剧膨胀，由于较高膨胀压力及较低联结强度，空鼓发生。此外，加工破坏及温差变化等也会加快空鼓的形成进程。



浙江省衢州市长生桥红军标语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大街村红军标语墙



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庙下——梧村古道的红军标语

覆盖是指画面被其他材料所涂刷、遮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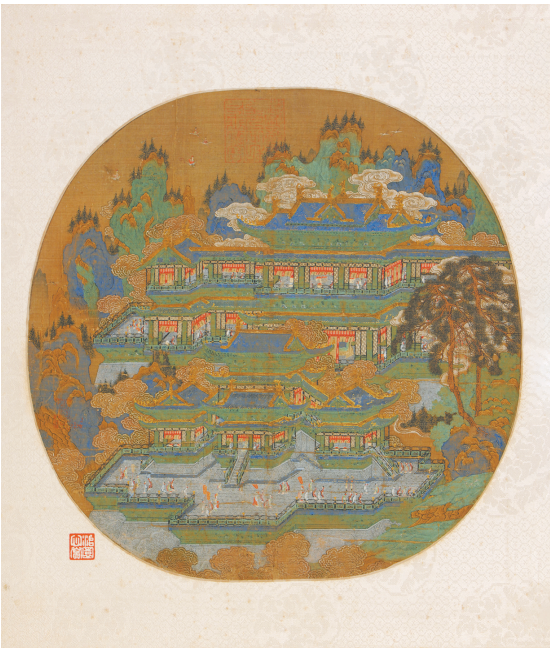
此外还有裂隙、龟裂、泡状起甲、涂写与动物损害。这五类病害与前面七类病害相比面积较小，调查中发现有泥蜂巢存在。

红军标语保护管理建议

里村红军标语位于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湖南镇里村村招龙潭纸槽南面墙上，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此次调查发现标语褪色十分严重，几乎不能辨认出标语内容。此地属亚热带季风气候，降水充沛、雨热同期，因此标语易受雨水冲刷而产生褪色等病害，且其表面的温差容易导致龟裂、起甲等病害。该标语位于一面独立的墙上，此墙为土墙，表面覆盖一层石灰，标语就书写在石灰层上。此墙虽有墙檐，但较为短小，并不能避免标语经受风吹日晒及雨水冲刷。此外，原址房屋已被拆除，仅剩这一面墙由几根木柱支撑，稳定性不高。标语所在地较为偏僻，仅后方有一户人家居住。

相应的保护管理建议为：根据上文的病害成因分析，发现雨水冲刷是各种病害产生的主要原因，因此防水工作应当是一项较为有效的保护措施，具体可考虑加装玻璃罩等防水装置；对墙体的加固也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能有效预防墙体坍塌导致标语消失；针对泥渍病害，对墙体表面进行清洗应当是一项较为可行的措施，并且清洗工作应当针对不同的区域选择适当的清洗方法；针对动物损害，应当进行生物防控；针对地仗脱落、空鼓等病害，预加固与注浆加固有一定的作用。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艺术与考古学院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元代《仙山楼阁图》团扇面

在中国古代绘画艺术的长河中,元代绘画以其独特的人文气质和多元的艺术风格占据着重要地位.然而,在众多水墨渲染的文人画作之外,一种精致富丽、工整严谨的绘画传统仍在延续——这就是工笔重彩界画.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重庆博物馆)珍藏的一级文物元代《仙山楼阁图》团扇面,正是这一传统在元代的杰出代表,也是目前国内少见的元代金碧重彩界画.这件纵横不足尺的绢本团扇面,不仅以其精湛绝伦的艺术技艺令人叹为观止,更以其跨越七个世纪的传奇流传历程,成为研究中国艺术史、收藏史和文化遗产史的珍贵实物见证。

艺术瑰宝:元代金碧界画的巅峰之作

展开这幅团扇面,观者首先会被其精细程度震撼.在有限的圆形画面中,画家构建了一个完整的仙境世界:层楼殿阁依山而建,飞檐翘角错落有致;祥云缭绕间,仙人乘鹤翱翔;松柏掩映下,群仙或驾鹤而来,或倚栏而望,或列队相迎.据统计,画面中共绘有百余位人物,每位人物身高不足7毫米,头部仅有芝麻大小,却能清晰表现眉目神情,衣纹流畅自然,姿态生动各异。

从技法上看,此画体现了元代界画的最高水准。所谓“界画”,指以界笔直尺划线,专攻宫室楼台题材的绘画门类。在这幅作品中,建筑结构的精准严谨令人惊叹——每一根梁柱、每一扇窗棂、每一片屋瓦都以极细的墨线精准勾勒,屋脊、瓦楞、山石等又再施以金线复勾,在光线映照下熠熠生辉。山石、房屋以青绿重彩层层渲染,苍松翠柏以细笔绘就,整个画面富丽堂皇而不失雅致,工整严谨而富有生气。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画中的建筑形制。1989年,著名建筑史学家、书画鉴定家傅熹年先生正是通过对画中建筑细节的分析,确定了作品的创作年代为元代。他指出,图中建筑“鸱尾”(屋脊两端装饰构件)向外弯曲的特征,是典型的元代建筑风格,与唐代建筑的鸱尾形制有明显区别。

递藏脉络:从王府秘藏到国家宝藏

这幅画作最引人入胜的,除了其艺术价值本身,还有它跨越七个世纪的流传历程。通过画作上的印章、题跋及相关文献,我们可以勾勒出一幅清晰的递藏图谱。

画作正中钤有“潞国敬壹主人中和存世传宝”篆书朱文印,这是目前所知最早的确切收藏记录。“敬壹主人”即明潞王朱常涝(1607-1646),字中和,号敬壹,为明神宗之侄,潞简王朱翊镠第三子.他不仅是皇室宗亲,更是明末著名的艺术家,在绘画、书法、音律、制琴方面均颇有造诣,也是目前所知此图最早的收藏者。他自号“敬壹道人”“敬壹主人”,取“敬守其一”之意,体现了他对艺术专注执着的精神。明末社会动荡,许多王府珍藏散佚,此画能保存至今,实属难得。

清代前期,画作进入两位重要藏家之手。首先是梁清标(1620-1691),官至户部尚书,其“蕉林书屋”以收藏宏富、鉴赏精审著称于世。梁氏收藏多钤有“蕉林书屋”“苍岩子”等印记,经其鉴藏的书画多为艺术史上的名品。随后,画作传至汤右曾(1656-1722)手中,汤氏为康熙二十七年(1688)进士,官至吏部侍郎,诗文书画俱佳。这一时期,画作增添了重要题跋:首页有清代胡升猷题“赤城霞灿”行书四字;封面为王澐(1668-1743)楷书“天台山图”四字。王澐为康熙五十一年(1712)进士,以书法鉴古闻名,其题签进一步提升了画作的学术权威性。

嘉、道年间,此图归麟庆、麟庆,满洲镶黄旗人,姓颜氏,字见亭,道光间累官江南河道总督,著有《河工器具图说》等.之后传其子崇实,崇实再传于子榭山。

光绪年间,画册为胡升猷九世孙胡微元由榭山处易得。胡氏为晚清官员、学者,其先人胡升猷的题跋使画册具有了家族传承的意义。据胡微元题记记载,此画曾先后为四川总督刘秉璋与时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觐观。前者许成都尹,后者许道台官职,但胡微元因“画册中有先人胡升猷题跋”而坚决拒绝。这一事件不仅体现了传统文人对家族记忆与文化遗产的坚守,更反映了在政治权力与文化价值的博弈中,有识之士的选择与风骨。

此后,画作转入抗日将领、“儒将”王缙绪(1885-1960)收藏。王缙绪不仅是军事将领,更是文化修养深厚的收藏家。1950年,新中国刚刚成立,文化建设亟待开展,王缙绪将军毅然将此画捐赠给西南博物院(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前身)。画作从私人秘藏转变为全民共宝,其研究、展示、教育功能得以全面实现。

鉴定与研究:学术价值的确认与提升

画作入藏博物馆后,博物馆开始了系统的鉴定与研究过程。20世纪50年代初,蒙文通教授授袁清人曰说,谓此画“韵味与唐人文学相合,可能是唐画”。1964年,全国古代书画鉴定小组将此画定为一级文物,然而关于其创作年代,则因其界画风格及栏杆样式被定为“南宋”。

直到1989年,傅熹年先生从建筑图像学角度进行分析,指出画中建筑特征与元代建筑形制完全吻合,从而论定此为元代画作。傅先生还特别指出:“如此精细的古代小幅绘画作品,国内仅此一件。”这一论断不仅解决了画作的断代问题,更凸显了其作为元代金碧重彩界画的稀缺价值。

文化意义:一件文物的生命史诗

元代《仙山楼阁图》团扇面的七百年流传史,不仅是一件艺术珍品的传承记录,更是中国文化传承观念的生动体现.在它不足盈尺的画面中,我们看到了元代画师极致的艺术追求;在它七百年的流传史上,我们读到了中国人对文化遗产的珍视与坚守。

从“秘玩”到“公器”,画作的流传经历了从明代王府秘藏、清代文人雅玩、民国私人收藏到新中国国家公藏的全过程.这一递藏轨迹,反映了中国社会对文物价值认知的演进——从个人雅趣到家族记忆,再到民族文化遗产,最终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

2017年,该画作被评为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新“镇馆之宝”之一,标志着其公共文化价值的正式确认。

（作者单位: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

商周铜器铭文工艺的复古倾向

张闻捷、黄妍颖在2026年第1期《故宫博物院院刊》撰文《工艺的复古——陈侯午三器铭文制法新探》认为：关于商周铜器铭文的制法，学界长期以来有模作法和范作法的争论。以陈侯午三器铭文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其铭文细节可以看出，陈侯午三器铭文虽内容相同，但在文字布局、铭文范嵌入方式、阳线方格使用及具体字形上存在差异，显示出制作较为粗糙，缺乏统一预设，可能由不同工匠分别完成。陈侯午敦（一）铭文中存在一系列泥条法的典型特征，尽管敦二和陈侯午簋铭文损坏较严重，但残存痕迹也显示其同为泥条法堆塑而成。结合其历史背景，陈侯午（田齐桓公）使用各诸侯进献的青铜为其母亲制作祭祀礼器，器物本身（簋、敦共用）具有复古倾向。由此可知，泥条法作为一种可行的青铜器铭文铸造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仍被使用于特定器物，反映出这一时期高等级贵族在工艺上的复古倾向。

东周时期青铜器金属垫片并非“滥用”

廉海萍在2025年第5期《江汉考古》撰文《东周时期青铜器铸造中金属垫片作用探析》认为：商周时期，金属垫片在青铜器铸造时的功能是用於外范与泥芯之间的定位与支撑的作用。东周时期，青铜器铸造中金属垫片的使用

数量明显增多，似乎偏离了早期单纯作为“芯撑”用于定位的用途。通过计算机数值模拟实验，分析了金属垫片对铸造过程的影响。在薄壁器铸造中，金属垫片的核心作用在于影响凝固过程，起到“内冷铁”的作用：能够加快局部冷却，减少缩孔，细化晶粒，使组织致密，提高性能（抗拉强度、延伸率，局部硬度提高），从而提高青铜器的耐用性。由此可知，东周时期金属垫片数量急剧增多，并非滥用或炫技，而是在器壁变薄的背景下，工匠们为改善铸造性能而进行的有目的的主动设置。这是古代工匠基于实践的经验对铸造工艺的重要革新，反映出东周时期铸造工匠总体技术水平并未衰退。

大汶口文化西进对中原腹地影响持久

秦存誉在2025年第5期《东南文化》撰文《变局与重塑：大汶口文化西进对中原腹地的阶段性影响》认为：大汶口文化的西进深刻影响着中原腹地的文化与社会变迁。其影响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大汶口文化（中期）的西进促进了秦王寨文化的创生。该文化是在本地庙底沟文化基础上，吸纳融合大汶口及江汉地区油子岭文化等因素形成的“混合型”遗存。这使得中原腹地出现前所未有的变局，社会发展重心开始由陕豫晋相邻地区向郑州西北转移。第二阶段，大汶口文化晚期的影响呈现全方位渗透，导致中原腹地相关区域“大汶口化”。第三阶

段，在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庙底沟二期文化等多方激烈碰撞下，中原腹地原有文化格局被解构与重塑。大汶口文化的西进对中原腹地的影响是持久且广泛的，它彻底改变了中原腹地长期由中原文化系统主导的状态，通过多阶段的冲击与融合，重塑了该区域的文化格局与社会形态。

警惕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数据操纵”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刘霞辉在2025年12月22日《中国社会科学报》提出：数据处理环节是问题的多发区。社会科学难以进行封闭实验，所得数据易受到波动和干扰，导致统计结果不尽如人意，难以得出有效结论。因此，学者会采用特定的统计方法来补全数据、剔除极端值、处理内生性问题等等。然而，有些统计方法缺乏公认的使用标准，不同学者处理相同数据时，得出的结论可能存在差异，这会引起人们的质疑。正是因为研究过程的灵活性，必要的数据处理和有意数据操纵，二者边界并非泾渭分明。以奇异值举例，这类研究数据中的个别特殊值，能对统计结果造成显著影响。由于难以从中提取有效信息，许多学者常将其简单作删除处理。实际上，奇异值背后可能隐藏着季节、地域甚至文化因素的影响。虽然从统计学角度将其剔除有合理性，但如果学者能从中挖掘出有价值的研究发现，无疑将是更好的处理方式。